

●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人 文 库



E S S J Z G X R W K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古

史辨伪与
现代史学

王煦华 编选

顾颉刚集



古

史辨伪与
现代史学

王煦华 编选

顾颉刚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官 超

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文库
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

——顾颉刚集

王熙华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6 字数 295,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664-6/I·1346 定价：24.00元

序

王煦华

一、生平及学术渊源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生于江苏苏州市。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堃等。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建国前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等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195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疑古思想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封建思想依托的伪古史,予以彻底的打击,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顾颉刚先生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他继承了我国历代

F047/334119

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及其成果,吸收了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科学知识,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对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的古史记载,作了系统的详尽的考辨,揭露出它们原来大多是出于神话传说。他的大量的切实的考辨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的工作,既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扫清了道路,又提供了经过考订的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

顾颉刚先生认为先秦至两汉的古书所记载的古史跟神话本是一物,必须先了解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所以他对我国的古代神话、传说及歌谣等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继承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的。他说: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①

他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看法则来自胡适和钱玄同。他说,胡适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使他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②。钱玄同则使他

①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②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辨清了今、古文家的真面目”^①。所以他说：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②

这就是顾颉刚先生的主要学术渊源，但他也受到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响。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开阔了他的眼界。顾先生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既可以用来建设真古史，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这更增强了他推翻伪古史的信心。由于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和他敏锐的眼光，辛勤的探索，再加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影响，这就使顾颉刚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古史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流传起来的，伏羲、神农则更晚了，到战国以后方出现。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

①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

②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一个反背。^①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②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③，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

①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②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前记》，载《古史辨》第1册。

③ 《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

工具”。他认为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 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①

胡适的这四点概括可以说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使用说明书，告诉人们如何使用它来研究古史传说。

为了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先生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

(1)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指出：春秋以前并无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而是各有各的始祖，春秋以后，“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2)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他说：“《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①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1册。

(3)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他说：“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4)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①

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导源于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②“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③之说。但崔述只是看到了这些表面现象，没有去深究；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也不可能透过现象去深究内在的规律性东西。因此他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而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过了一百多年，顾颉刚先生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揭开了“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内在秘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因此它既是中西文化结合后长出来的硕果，又是我国历代考辨古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性总结。它的出世是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性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

① 《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

② 《考信录提要》上。

③ 《补上古考信录》卷上。

个新的时代。

顾颉刚先生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发表以后，即从事于古史传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考辨，后来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来对这一史观作深入的系统的阐述。因此其内容的表述不够完善之处，也引起一些议论和补充；但任何东西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完整无缺，因此其疏略之处，正是需要后来的考辨古史的学者继续充实、发展、提高和完善的。

三、探索古史传说的演变

古书上所讲的唐、虞以前的古史，前人早已指出是荒谬无稽的神话传闻和后人伪撰的史迹，不可相信。但对尧、舜、禹时的古史，则认为有《尚书》的《虞、夏书》可据，可以相信。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也始于尧、舜。“五四”以前，孔、孟的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绝对的权威，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是“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所以他们的辨伪只敢辨唐、虞以前的伪史，只敢辨“经书”以外的伪书，不敢对尧、舜、禹这些大圣人有所怀疑，不敢对“经书”有所怀疑。清代杰出的辨伪大师崔述说：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于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于《正录》，既以明逆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于孔子之意无悖焉尔。^①

崔述这样大胆疑古辨伪的人，尚且不敢违反道统，有悖于孔子之

^① 《考信录提要》卷下。

意，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所以顾颉刚先生公开怀疑尧、舜、禹，怀疑经书，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发表，不仅封建卫道者群起而攻之，就连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也囿于传统的偏见，不以为然。他说：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①

可见怀疑“经书”中所记载的尧、舜、禹为伪史，在当时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顾先生的怀疑“经书”，怀疑古圣，突破司马迁以来“考信于六艺”的框框，闯入前人所不敢进入的禁区，表明他的辨伪与前人的辨伪有了根本的区别，他已由儒者的辨伪发展为史家的辨伪。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从神演化为人。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扼要地论述了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他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

^① 《古史新证》第1章。

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顾先生就这样简明地揭示了历来公认的盘古开天辟地和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1929年,他在燕京大学教中国上古史时,编著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把《诗经》、《论语》、《孟子》、《尧典》、《荀子》、《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吕氏春秋》、《庄子》、《淮南子》、《史记》、《汉书·艺文志》、《五帝德》、《帝系》、《世本》、《春秋繁露》、《易传》、《世经》、《月令》、《谡纬》、《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孔子家语》、《孔氏尚书传序》、和《潜夫论》等书中所载的古史传说,分为“儒家以前的记载”、“汉以前的儒家记载”、“战国、秦、汉间的非儒家记载”、“西汉时的儒家记载”、“刘歆的历史系统”、“谡纬的历史系统”、“《世经》、谡纬以后各以己意整理出来的历史系统》等七个大类,从它们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承前启后的痕迹,又从它们发生时代的背景求出它们异军突起的原因,并观察它们起过什么样的变动,以推翻它们的史实地位而恢复它们的传说地位。以后他又把讲义扩充,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三皇考》两篇论文,详尽地论述了战国、秦、汉间三皇、五帝演化的历史;又用通俗的体裁写成《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的由来,文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本论述汉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名著。

顾先生还对古史传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深入的考辨，提出新的看法。在《禅让说起于墨家考》中，提出儒家所盛传的禅让的故事，是由墨家流入儒家的。他说：禅让说里的舜、禹都是从庶人出身的，这件事若果真是儒家所造，在儒家的亲亲贵贵两个主义之下，哪里会有庶人出身的天子？这是不待辨而自明的。“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里产生出来的；倘若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想，就决不会有禅让的传说。”因此，“禅让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而造出来的。”但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禅让的故事乃是后人加添上去的”。

关于舜的故事，顾先生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牵涉到大量的古书、古迹、古制，使得人头晕眼花，不易一一查明，他就借着清末宋育仁的《虞初小说》的回目，写成《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一文，找出它所依据的资料，并加上解释和评判，揭示了舜的许多事迹都是由神话、故事掺入历史的。

禹的来源，顾先生受了他的老师崔适“禹的本义为虫名”^①之说的启发，据《说文》“禹，虫也”的解释，“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九鼎是夏铸的，……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②。这就是说他以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此后，他“因为九鼎不铸于夏代，禹说才起于西周的中叶”，修正了这个假定。他说：“我现在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这就是说他“坚持禹为动物”之说，修正“出于九鼎”之说。他列举了九项理由，对禹的来历作了“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的新假定。^③到1937年时，他又放弃了

① 《史记探原》卷二。

② 《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1册。

③ 《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7册下编。

这个假定，从九州、四岳的原在西方，提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的新说。他说：禹原为“戎之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对于“禹为动物”之说，他终生坚持不变。1952年他在《叔向名禹》的一则笔记中说：

《叔向父段铭》云：“叔向父禹曰。”孙诒让曰：“《说文》：‘𪔐，知声虫也。重文𪔐，司马相如说：从向。’”《玉篇·虫部》云：‘𪔐，禹虫也。’若然，‘禹’、‘𪔐’一虫，禹字叔向，即取虫名为义。向即𪔐之省。此可证司马相如，顾野王说矣。”（《古籀余论》卷中）禹之为虫，又得一证。①

1954年，在《高山族之蛇图腾》的一则笔记中又说：

近在中央民族学院见台湾高山族之器物，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或延体于筒，或伸颈于壶，或蟠于人像之两肩。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夏器固尚未发现，然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②

可见，他毕生坚持禹为动物之说，常常留心证据，以证其说。

1937年，他与童书业合写《鲧禹的传说》，把二十年代古史讨论中涉及的鲧、禹传说的来源及其演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们以为周人“虽说到禹，但并未把他和夏发生关系，在《诗》、《书》

① 《顾颉刚读书笔记·虬江市隐杂记(4)》。

② 《顾颉刚读书笔记·法华读书记(21)》。

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两者间毫无交涉。一直到战国以后的文籍里,我们才发现禹是夏代的第一世君主。《国语·郑语》说:‘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这是‘夏禹’一名的始见”。“在《山海经》和《天问》等记载原始神话的书里,已把鲧、禹说成父子。”“鲧与夏发生关系也始于《国语》和《左传》。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以前相传都以为鲧用湮的方法以致失败,禹改用疏的方法得到了成功。”他们说:其实这个传说,起初都说鲧、禹治水用的都是同一的“湮”、“填”的方法。鲧的失败,是由于“不待帝命”,而不是“湮洪水”。到了战国以后才出现鲧防洪水而失败,禹疏洪水而成功的说法。所以会这样改变,是由于战国时出现了防洪筑堤和疏水灌溉两种办法,筑堤害多而利少,疏水有利而无弊,由此防洪水的故事便渐归了上帝所殛的鲧,而疏洪水的故事就归了上帝所兴的禹。1957年顾先生又写了《息壤考》,对于鲧、禹以息壤治洪水的先期神话,作了新的考辨,并对鲧、禹治水故事的演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顾先生与童书业合作的《夏史三论》,是论述启和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故事的,他们认为这些传说不是古代的史实,三康的传说从启分化而出,少康中兴的故事是东汉人造出来的。联带又叙述五观和羿、浇等故事的演变,指出五观的传说与扈、观有关;羿的传说在先秦、西汉时非常纷歧,到西汉中叶以后才渐渐统一,浇的传说与象的传说有关。

对商代的纣王,顾先生写了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说明纣的罪恶也是层累地加上去的,在《尚书》(除伪《古文尚书》)中,纣只是一个糊涂人: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他的七十条罪恶是从东周到

西汉陆续增加上去的。接着他又写了一篇《宋王偃的绍述先德》，以宋王偃的“身死国亡，为天下大谬，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的同样例子，再一次说明古代史实很多出于传说，不能轻信。

顾颉刚先生破坏不可信的伪古史，并不是否定古代史，而是还伪古史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在《中国古代史述略》这篇通俗文章中，扼要地论述了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的关系，并在《茫昧的夏王国》和《商王国的成长和发展》两节中把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结合起来叙述，体现了他研究古史的最终目的。

四、探索古代的民族和地域

两千余年来，大家信从《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上古世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出于一元；又信从《禹贡》、《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以为中国的疆域在黄帝时已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同，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地域也早就统一了。顾先生认为这些传统的说法不符合先秦的历史实际，为此作了许多切实的探索与考辨。

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就指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如“《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又说：“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郟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

顾先生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又列举华夏

族以外的各部族说：“当春秋时，居今河北省南部的有白狄，居今山西省南部的有赤狄（这是说一个大概，白狄也有在陕西的，赤狄也有在河北的）。其他以戎为名的，陕西有犬戎、骊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卢戎，河南有陆浑之戎及扬拒、泉皋、伊雒之戎。以夷为名的，山东有莱夷，江苏与安徽间有淮夷。……姓嬴的有江、黄、徐诸国。姓偃的有六、蓼、桐、英氏及舒蓼、舒庸、舒鸠诸国。不详其姓的又有州来、钟离、钟吾诸国。更往南行，又有群蛮和百濮。这些部落各有其历史的文化”，也无公认的共同始祖。

在此文中接着又论述了由于民族合并而产生的一元观念的过程，他说：“过了春秋，越灭了吴，就统一了东南部；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两流域。秦灭义渠和蜀，就统一了西北和西南两部。齐向海上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族的地域。剩下韩、魏，虽困居腹地，不得发展，也能融化中原诸戎、狄。……这样地工作了二百余年，于是春秋时的许多小国家和小部族全不见了。再经秦、汉的统一，于是他们真做了一家人了。”为了使它们能融合起来，“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后人说他是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和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部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禹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就同祖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以上说的